

大国汇集亚洲与中国“经略周边”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谷源洋

【内容提要】 世界大国聚焦亚洲，究其原因看中了亚洲的重要战略地位及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中国作为亚洲“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其对外战略重心应该立足于亚洲地区。不同之处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是以军事为主轴，而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外交政策则是以突出“经略周边”为重点，旨在构建中国同邻国相互开放的新模式，不断提高相互开放的水平。中国“经略周边”的总体思路和规划已越来越清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中国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愿意把中国的发展惠及到周边国家”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是我国“经略周边”的对外开放大战略。

【关键词】 亚洲世纪 经略周边 海上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 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自2007年美国先后爆发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进行了反思，反思的结果是：

首先，美国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国所说的全球经济失衡系指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顺差，美国家庭储蓄率低，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储蓄率高，因而美国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美国金融危机亦负有责任。其实美国追求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目是为了防止经济全球化导致权力分散化。然而，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不可违逆的大趋势。

其次，美国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重振国内制造业，通过减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在海外的制造业“回巢”，以增加国内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奥巴马于2010年8月签署的“制造业促进法案”，把公司税从35%降至28%，以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推动高端先进制造业发展，使其制造业产值在GDP

中占比增加^①，创造了 20 多万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奥巴马宣称美国的劳动力大军、更低的能源成本和逐渐改善的经济将使美国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其目标是未来 5 年为制造业和其他领域吸引 1 万亿美元的新增外来投资，因而要求美国驻外大使把吸引外资作为首要任务。然而，“出口倍增计划”实际执行结果并不理想。

第三，美国提出了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把美国同亚洲紧密联结起来，按高标准规则建立堪称“21 世纪的自由贸易区”，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然而，TPP 谈判遇到许多障碍，参与谈判方都提出了各自加入 TPP 的“例外”条款，即使最终达成共识，也不是美国早先设想的“高标准原版”。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推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实施硬实力与软实力相互兼容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希拉里·克林顿宣称“美国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今后 10 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洲地区”^②。尽管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但美国“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权宜之计。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 2014 年新加坡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会议上公然宣称美国减少军事支出，但不会减少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除美国“重返亚洲”外，世界其他大国也都抱着不同的目的和心态将其外交政策向亚洲倾斜，印度积极推进“向东看”的外交政策；俄罗斯把参与亚洲事务提升为国家战略；欧盟同亚洲展开了定期的“亚欧峰会”；安倍上台以来，亲自跑遍了东南亚各国，大搞政治经济外交。世界大国聚焦亚洲，究其原因主要是看中了亚洲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趋势。



亚洲地域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并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堪称世界第一大洲。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亚洲曾有过自己的辉煌，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列强对亚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与侵略，亚洲的强势经济地位逐渐式微。

二战后，由于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亚洲率先涌现出一批跳跃式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及“准新兴工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越南在 80 年代中、印

① 2011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其 GDP 的比重达到 11.5%。

②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外交政策》，2011 年 11 月号。

度在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变革,促进了各自经济的腾飞,为东亚乃至亚洲的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拉动效应”。在1997~2007年的10年里,亚洲国家和地区克服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地区。

21世纪谁主沉浮?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亚洲的世纪,而奥巴马宣称是美国的世纪。然而,国际社会却普遍看好亚洲,对其发展远景抱有乐观的期待,并预言21世纪世界经济的热浪将继续吹向亚洲地区。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2010年亚洲出口额已经占到全球出口额的31.6%,比2000年提高了约5%;2010年亚洲区域贸易已经占到亚洲对外贸易总额的52.6%,较2000年增加了3.7%。亚洲已经形成了多层结构、互为补充的区域合作格局。

中国和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早已替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已不复存在。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①。2012年1月中旬,印度总理辛格对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说“印中合作将改变世界”。许多国家早已看到了中印崛起的势头及其崛起的重要性,并给予积极的评价。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展望2020年描绘全球未来》的预测报告指出,今后15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足以匹敌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在地缘政治上产生剧烈的冲击”。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世界从未见过这两个占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在同一时刻崛起,中国和印度拥有改变21世纪全球经济的实力和活力^②。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0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甚至说,中印的崛起有可能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经济事件。

中印两个大国的相继崛起,带动了亚洲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本《福布斯》月刊2008年5月号发表了李光耀的题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是亚洲》的文章,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邮报》2011年11月18日发表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文章称“21世纪属于亚洲”。同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撰文指出“亚洲世纪无疑是可信的”,“亚洲世纪并非亚洲的世纪,这将是全球共同繁荣的世纪”^③。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亦认为亚洲世纪并不意味着亚洲将支配世界,最重要的是21世纪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②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商业周刊》,2005年8月22日。

③ 黑田东彦:《实现亚洲世纪必须做什么?》,《日本时报》网站,2011年5月11日。

全世界的 21 世纪^①。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亚洲特别是东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困人口逐步减少，亚洲人正在成为“富裕世界”的一部分。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150 年来，西方享受了进步与繁荣，而亚洲却遭受贫困与饥饿。现在，亚洲正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这将使他们重新得到他们以前文明所拥有的辉煌和荣耀。与此相反，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越演越烈。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已使 4600 万美国人生活在贫穷之中，创下近 52 年有贫困人口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和比例均超过 197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将近 2100 万美国人每人全年收入只有 5672 美元。华盛顿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大企业 CEO 在 2010 年的平均收入为 1080 万美元，比上年增加了 28%，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为 33121 美元，只增加了 3%，CEO 的收入比普通工人高出 325 倍^②。

财富分配不公加剧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从 2011 年“伦敦之夏”、“华尔街之秋”到 2012 年初比利时全国大罢工，一批批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走向街头，猛烈抨击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美国政要一向崇拜资本主义制度，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现仅有 50% 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有肯定看法，而 40% 的人则是否定的，说明资本主义“病了”。马哈蒂尔在《西方有必要重归资本主义根本》一文指出“世界不可能恢复原状了。欧洲人必须接受：欧洲中心主义的时代实际上一去不复返了，欧洲必须向东方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③。

二

亚洲是新兴经济体的诞生地，亚洲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近几年来，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下滑。尤其在美联储退出 QE 的影响下，自 2013 年 5 月以来，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着资金撤离、货币贬值、国债收益率提升等压力，加速推动经济持续向下滑行。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多种利好因素：其一，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了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存在的经济“瓶颈”正在加速推进改革、调整与转型的步伐；其二，中国等亚洲新兴市

① 日本《东洋经济》周刊，2012 年 1 月 14 日。

② 迈克尔·舒曼《如何拯救资本主义》，美国时代周刊，2012 年 1 月 30 日。

③ 英国《金融时报》，2012 年 1 月 11 日。

场国家依然存有不可忽视的后发优势和现实优势,包括家庭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雄厚、工业化提速、收入增加、购买力上升和创新能力趋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通货膨胀可控、实行浮动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其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未来二、三年内依旧保持较为宽松的基本面,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回流发达国家的力度不会太大和持久;其四,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力度趋强,将拉动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加。因此,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不会“从天上掉到地上”而一蹶不振,出现持续性倒退的概率不大,继续崛起依旧是一种难以逆转的大趋势。正如渣打银行的报告所说,虽然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发展减速令人担忧,但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几个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稍加改革就会触动经济振兴^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预测,2014年和2015年,亚洲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4%和5.5%,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4年和2015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率为6.3%与6.4%。按汇率计算,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现已达到27.5%的水平,到2020年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区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然而,要保持亚洲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并最终实现“亚洲世纪”,亚洲各国不能躺在过去和现在的“繁荣”上预测未来的亚洲,而需要共同应对系列挑战,包括实现包容和公平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增强创新能力;实行金融和货币改革;管理好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一步降低能耗强度和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减轻污染适应气候变化;提高经济治理水平;纠正分配不公;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增强相互间政治和战略互信,有效管控分歧与危机,营造周边和谐环境,等等。

但由于美国涉足亚洲事务,日本等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东盟推行的大国均衡化战略已经并将继续受到严重冲击。东盟大国均衡化战略的本意是,不让东盟被任何一个大国独自控制,而是让各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相互制衡、相互制约,使东盟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间求得生存与发展,同时又要提防各大国在自己的地盘上发生争斗,损害自己的形象和利益。李光耀用“大象与小草”形容了他最先提出的大国均衡化战略,那就是“大国是象,东盟是小草”,如果大象在东盟这块草地上打斗起来,那么小草就会被踩死了。然而,自美国“重返亚洲”以来,美日所做所为违背了东盟多数国家的意愿。

在上述环境变化下,中国作为亚洲“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其对外战略

^① 印度《商业旗帜报》网站2013年11月6日。

重心应该立足于亚洲地区。不同之处是美国“重返亚洲”抑或“亚洲再平衡”战略是以军事为主轴，利用中国同部分亚洲国家存在的海上主权争议，制造政治分歧和扩大矛盾，强化军事同盟，加强同亚洲国家的军事、政治、安全与经济联系。而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外交政策则是以突出“经略周边”为重点，旨在构建中国同亚洲邻国相互开放的新模式，不断提高相互开放的水平。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不认同、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中国不想与其他大国把亚洲变成相互争斗的博弈场，而是想把亚洲作为中国与其他大国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的试验田。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符合东盟国家倡导的“大象理论”。

三

自2013年10月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经略周边”的总体思路 and 规划已越来越清晰：一是加速推动上合组织向纵深合作发展，在战略、军事、政治高水平合作的基础上，强化整体和相互间经济合作；二是建设面向俄罗斯、中亚和欧洲国家间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三是加速推动中韩、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及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RCEP）三大谈判；四是建立中巴、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五是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前四项战略举措已先后启动，并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但“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则是当今时代崭新的概念，同“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样都是中国国家大战略和大布局，需要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切实可行的总体实施规划。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其建设路径及合作领域将是宽泛的、多层次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经历由易到难、从点到面、以线到片的跨区域经济大联合、大合作与大发展的过程，既牵涉到中国同相关周边国家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协调，也涉及到具体项目规划设计标准要求的不同，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难度很大，不应急于求成，只能稳步推进。

首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明确指导思想和原则，突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和原则。“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中国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愿意把中国的发展惠及到周边国家”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但不要显露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为主导的心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涉及海洋经济合作、海洋安全合作以及海洋历史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

但其基本属性似应定位于跨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经略周边”的对外开放战略。因此,不宜把“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政治化”,以海上领土主权争议划线。要纠正不利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言与行,例如对东盟国家采取有差别的外交、经贸政策,重点孤立越、菲,弱化东盟在政治上的一致性的做法。中国有必要对处理南海问题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进行策略性调整,不再追求危机或冲突的尽快化解,不必急于修补与挑衅国的关系,不以“恢复常态”为行动目标,等等。长期以来,我国对周边缺乏系统的研究,有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导致我国对周边的历史知之甚少,影响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因此,我国史学界可“学术先行”,在国家支持下深入探讨周边国家从古至今历史演变进程,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以及周边国家与中国交往的历史。^①不仅如此,还要立足现实、联系现实,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有争议的问题,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其次,“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定位于“经略周边”的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但并不意味着把我们来之不易的外汇储备不惜成本的用于海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不意味着海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完全由其他相关国家支出。我们需要准确把握“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到周边国家”的尺度,首先要大体搞清楚海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项目的需求量有多大?投入资金需要多少?中国究竟能够拿出多少钱?在明确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尚须做好投资“成本与效益”专题研究与分析。应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虽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大头,但并不是“一路”建设的全部内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似应包括海底资源共同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航运安全、海上渔业合作、海上旅游观光、海上救援、沿海城市友好合作及人文交流,等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规模越来越大,2012年,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贸易总额为690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7亿美元,占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7.4%;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422亿美元,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总营业额的37.9%^②。上述三组数据远高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虽不等同于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但启动起来却能够带动各相关方货物贸易、

① 第四届《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席会议研讨会》报道,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社专刊,2014年5月30日。

②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2014年4月18日。

服务贸易及投资的大幅提升，因而可以把“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为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升级版”。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对的一个关键难题是如何解决融资问题。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 年至 2020 年，亚洲各成员国需要基础设施投资 8.22 万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为 3000 亿美元。这些潜在投资从哪里来？这是国内外相关方所关注的现实问题。

中国拥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和技术的双重优势。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表示愿意通过设立专项优惠贷款、成立专项基金，给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2013 年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尼时提出了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倡议，用以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的巨大资本缺口，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服务，提升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二战后建立起的国际金融体系始终由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人把持，世界银行行长则由美国人垄断，而日本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已建立了由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及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当今的国际金融体系早已不符合世界格局变化的现实，新兴市场国家强烈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改革，但这两大金融组织的改革总是落后于时代变化。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长期享有“过度特权”，因而美国国会对于 IMF 改革持拖延态度。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得到了积极响应。但由于亚投行的起始资本金为 500 亿美元，仅为亚洲开发银行资本总额的三分之一，远远满足不了亚洲区域内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因此，亚投行可采取开放性的股份制形式，吸收亚洲区域内外经济体出资入股，不断扩大资本金规模。中国应根据自身的经济规模与能力，力争在亚投行投资股权中占有较大比例，以期发挥重要作用。建立亚投行并非是去替代亚行，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是互补和伙伴关系，开展相互间共同融资合作与配合。

作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成立亚投行的倡导者及其重要的参与方，中国需要加强国家投资的力度，尤其需要动员私人资本积极参与。最近几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约占 GDP 的 9%，但其中只有不到 0.03% 来自私人资本。这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亚洲其他国家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约占 GDP 的 7.2%，其中私人投资仅为 0.2%，远低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1.9% 和 1.6%^①。因此，解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瓶颈，各国不能仅仅依靠

^①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吸引更多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证券报》，A05，2014 年 5 月 7 日。

财政投资，必须调动社会融资积极参与，相关国家政府之间需要签订保护私人投资的协定。

第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解决两个重大政治关键点：一是如何处理同一些国家在南海的主权争议；二是怎样做好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工作。“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国际上通用的在划定海上主权之前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载体，应真正贯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重要原则。国内外均有人认为南海主权不解决、不划定就不可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但南海主权争议将是一场长期的纷争，不能期望在短期内解决。在南海主权争议难以解决的形势下，似可采取先放一放，维持现状，这对我国并无大碍。邓小平提出的“主权为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实质就是维持海上主权争议现状。

为把中国与东盟四个声索国关于南海主权争议缓和与稳定下来，似可“淡化”海上主权争议，对海上“维权、维稳”采取有差别政策，在东海对日本采取“以维权为主”，而在南海总体上应采取“以维稳为主”的原则；如果中国南海海空没有受到明显威胁和挑战，则不宜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而是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尽管有的国家不想“淡化”南海主权争议，刻意挑起事端，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但不会根本撼动海上合作大局。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始终需要高度警惕个别国家试图破坏“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谋图，对挑事国家进行必要的反击，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不矛盾。

美国在南海主权争议中采取的政策立场，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偏袒性和挑衅性，妄自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海上现状、违逆国际法理和规则以及破坏海上自由航行。然而，我国应对力度显得不够，声音不强，好像有些理亏和被动，有关方面今后应组织力量，写出系列有份量的文章予以反击，从被动转为主动。同时，中国仍需多做美国的工作，尽量减少“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阻力。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选项有分歧、有矛盾，但也并非完全对立。美国要求相关国家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海上主权争议；要求中国不要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要求中国与东盟加快“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谈判进程；要求各有关方按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等等，这些要求与中国之主张大体一致，因而不必把美国的上述诉求视为对中国的施压。

第五，“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国家战略选择，涉及到众多国家的利益，必须做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协调。相关沿线周边国家虽然普遍关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识存在差异，因而我

财政投资，必须调动社会融资积极参与，相关国家政府之间需要签订保护私人投资的协定。

第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解决两个重大政治关键点：一是如何处理同一些国家在南海的主权争议；二是怎样做好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工作。“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国际上通用的在划定海上主权之前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载体，应真正贯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重要原则。国内外均有人认为南海主权不解决、不划定就不可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但南海主权争议将是一场长期的纷争，不能期望在短期内解决。在南海主权争议难以解决的形势下，似可采取先放一放，维持现状，这对我国并无大碍。邓小平提出的“主权为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实质就是维持海上主权争议现状。

为把中国与东盟四个声索国关于南海主权争议缓和与稳定下来，似可“淡化”海上主权争议，对海上“维权、维稳”采取有差别政策，在东海对日本采取“以维权为主”，而在南海总体上应采取“以维稳为主”的原则；如果中国南海海空没有受到明显威胁和挑战，则不宜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而是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尽管有的国家不想“淡化”南海主权争议，刻意挑起事端，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但不会根本撼动海上合作大局。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始终需要高度警惕个别国家试图破坏“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谋图，对挑事国家进行必要的反击，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不矛盾。

美国在南海主权争议中采取的政策立场，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偏袒性和挑衅性，妄自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海上现状、违逆国际法理和规则以及破坏海上自由航行。然而，我国应对力度显得不够，声音不强，好像有些理亏和被动，有关方面今后应组织力量，写出系列有份量的文章予以反击，从被动转为主动。同时，中国仍需多做美国的工作，尽量减少“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阻力。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选项有分歧、有矛盾，但也并非完全对立。美国要求相关国家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海上主权争议；要求中国不要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要求中国与东盟加快“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谈判进程；要求各有关方按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等等，这些要求与中国之主张大体一致，因而不必把美国的上述诉求视为对中国的施压。

第五，“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国家战略选择，涉及到众多国家的利益，必须做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协调。相关沿线周边国家虽然普遍关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识存在差异，因而我

们既要知己更要知彼，保持与相关国家的沟通，深入了解相关国家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怎么看，怎么想，有针对性的化解其疑虑。只有中国和相关沿线国家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才能得以启动和展开。为此建议：

一是我驻相关沿线国家使馆、商务处、记者站以及国内相关省市自治区似应加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调研工作，及时反映“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商机和存在的问题。

二是尽早出台中国早已提出的“海上合作基金”的使用办法，利用海上合作基金开展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联合研究，发展好海上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上丝绸之路”。这种联合研究与探讨应是有组织的安排，以中国和东盟国家学者和企业家为主体的联合研究似可先行一步，彼此间进行坦率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三是国内学术界的研讨要讲效益，不宜泛滥，媒体宣传不宜公开把“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公开说成是为了应对美国“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应对美国主导的 TPP。涉及国家战略大事不能搞“全民外交”，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必须严格按照外交口径行事。

四是国内各有关省、自治区似应结合所处区域地位及对外经济合作条件等，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规划方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分为国内段与国外段，两者建设要同时并举，但首先我们要把国内段的建设做好，以带动国外段的建设。

五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发展海洋经济，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互补性产业合作项目的支撑，才能逐渐形成巨大的海上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并逐渐降低“三流”的成本，提高经济合作效益。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须树立以相关方企业为中心，以发展项目为重点，以通关便利化为助力的发展思路。各专题研究似应突出各方需要的发展项目，没有企业参与开发项目，就无法形成海上的物流、人流和资金流。

伴随“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逐步展开与拓展，海上运输会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局面。为适应这种发展，我们需要提前做好两件大事：首先是在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建立三大自由港，实行人、财、物的完全自由流动。其次是以股份公司形式，与沿线国家共同组建海上运输船队，推动海运事业的发展。

第六，本着“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协调和处理好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和亚太跨区域经济整合的关系。美国历来反对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将其排除在外，因此，美国主导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寻求对美国占优势的贸易安排，试图打破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僵局。

从 TPP 设置的规则分析，有的同中国现行政策相矛盾，有的对中国不公平，有的短期对我不利，但长期看则是我们所需要的。由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现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处于从世界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化之中，世界贸易越是自由化和便利化就越对中国有利。因此，TPP 的“高标准规则”与我国改革方向并不矛盾。我们需要做的是上海自贸区在试验过程中应逐渐缩减“负面清单”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度，让中国企业能够逐渐适应 TPP 的高标准规则，甚至可以提出比 TPP 更高标准规则的要求，营造对我更为有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同时，中国作为亚洲的重要成员，可以对 TPP 缺乏包容性、透明性和非歧视性以及美国通过 TPP 替代和削弱亚洲区域内合作的意图提出批评。

当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形势已不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状况，已经形成了多层结构、互为补充的区域合作格局。进入 21 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贸易额从 8000 亿美元增加到 3 万亿美元，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从 1.5 万亿美元增加到 4.8 万亿美元，这充分表明亚洲区域合作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亚洲一些国家虽然加入 TPP 谈判，但绝不会放弃亚洲区域内合作。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美国控制的 TPP 是两个不同的协定，但两个协定都反映出强化或超越 WTO 的价值取向，不同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规模、结构与文化差异，决定了不同成员国加入谈判的复杂性和利益多元化。因此，亚洲有些国家既是 TPP 的谈判国，也是 RCEP 的谈判国，两者不应处于对立的位置，引起所谓“经济冷战”。

然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毕竟是不同的两个区域概念，不应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说成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亚洲合作需要依靠亚洲国家自己，今后我们似应多谈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我国对区域经济合作所采取的策略应是“你搞你的跨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我搞我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着力搞好中韩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三大谈判。